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图书馆学专业用书

中文工具书教学参考资料

朱 天 俊 李 国 新 编



SHUGUANXUE

书目文献出版社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图书馆学专业用书

中文工具书教学参考资料

朱天俊 李国新 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



2 032 7710 4

zhōng wén gōng jù shū jiāo xué cān kǎo zī liào

中 文 工 具 书 教 学 参 考 资 料 /

朱天俊, 李国新编.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7.9

331页; 32开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图书馆学专业用书

1.60元

I. 中… I. ①朱…②李… II. ①中文—工具书—电视大学—教学参考资料②工具书—中文—电视大学—教学参考资料

IV. G256.5 37.656 G25

中文工具书教学参考资料

朱天俊 李国新 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文津街七号)

河北省秦皇岛市第二印刷厂排版

河北省涿州市西辛庄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5625印张 235千字

1987年6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0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47,001—57,000册

统一书号: 7201·155 定价: 1.60元

说 明

学习中文工具书课程，有助于利用工具书解难释疑，获得检索文献的途径与方法。要使用好工具书，不但需要掌握《中文工具书》教材中所讲述的内容，而且还需要了解一些必要的文献知识以及查阅工具书必备的相关知识。为此，根据学习的需要与可能，针对学习当中的难点，并考虑到国内电子计算机在文献检索和工具书编纂方面运用的趋势，我们选录了十七篇文章，编成《中文工具书教学参考资料》，供参考。

朱天俊 李国新

一九八六年七月

目 次

谈古籍的普查和情报	胡道静 (1)
略谈汉语辞书的演进	刘叶秋 (33)
类书常谈	刘叶秋 (44)
类书的文献价值	洪湛侯 (53)
中国古籍丛书概说	刘尚恒 (69)
中国地方志浅说	朱士嘉 (86)
中国年谱概说	杨殿珣 (103)
百科全书概论	常 政 (130)
百科全书的编纂体制与体例	王伯恭 (149)
年鉴及其索引	葛永庆 (158)
索引简论	黄 筠 (169)
中国古人的姓名字号	楚 庄 (177)
中国历代官制简述	聂崇岐 (188)
历代行政区划略说	谭其骧 (216)
中国历史上的纪年	刘乃和 (229)
电子计算机检索系统	高崇谦、朱孟杰 (299)
计算机和辞书编纂	耿立大 (320)

谈古籍的普查和情报*

胡道静

毛泽东同志论述中华民族的开化史，列举多项光辉灿烂的业绩，其中之一是“有丰富的文化典籍”。我国古籍数量之多，是举世莫与伦比的。继承和清理这份从奴隶社会经历长期封建社会累积和遗留下来的文化典籍，“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以此作为“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可以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建国以来，在党的正确领导和关怀下，在批判继承文化遗产和大力保护与整理出版古籍的方针指引下，我国整理和出版了古籍约两千多种。最近，陈云同志又对古籍工作做了重要指示，把它提到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对青年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高度来认识，从而大大地引发了古籍工作同志的责任感和积极性。

在浩若烟海的古籍中，需要整理出版的虽然为数也很大，但这只是抉择其精华的部分，在整个遗存中的比数则是微小的。可是，在整理出版精华部分的过程中，所有的整个遗存都可作为稽核、参考、研究的用途。再则，重要的是，如李一氓同志所指出的：“古籍整理工作的最终结果应当有一个

-
- 本文是作者在一九八二年三月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重新恢复后首次会议上提出的一项建议书。会后经过修订并补充了“三类历史资料应受到保护”、“域外中国古籍的收藏”、“需要建立外文译本书库”三个文段。标题为本刊所加。

归纳，就是要总结出一部有关学科的概论出来，这种整理方法就是研究。”例如，“如果不写出一部《中国哲学史》，只是整理出一大堆宋明理学书、佛书，有什么意义呢？它不能说明在中国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哲学思想，又是如何发展的，而它们之间又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对中华民族的成长起过什么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因此，研究也是整理，并且是很重要的整理方法。”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整个古籍遗存，都成为研究工作中的矿砂。可以在一吨矿砂中只提炼出一克拉钻石，但是必需要有成千上万吨矿砂才行。

于是，摆在我们古籍工作者面前，还有个重要的后勤任务：对于我们的古籍遗存，应当很好地清一清家底，开出总帐目，以方便整理者、研究者按图索骥。应当和人口普查、资源普查一样，搞好古籍普查工作。

清查古籍家底的工作，建国以来，我们已经做了两项工作：第一是就丛书收录的范围对古籍做了普查工作，提供了三大卷《中国丛书综录》；第二是就方志的范围做了普查工作，提供了《中国地方志综录》。正在进行中的一项巨大工作是，编纂全国性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中国丛书综录》上海图书馆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编成了《中国丛书综录》三大卷，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综录》普查了全国二十个省、市、自治区的四十一个大型图书馆所收藏的中国古籍丛书二千七百九十七种。第一卷著录各丛书收录的书目；第二卷为丛书子目的分类目录，由于经过过细的稽勘异同，子目七万多条中一书为两种以上丛书所收的，分别作一种或数种处理，最终共得三万八千八百九十一一种，这就成了丛书中收录古籍的帐面总数。

（如果要以不同的版本即两种以上丛书所收的一书来计算，可以还原为子目登录的七万多项）；第三卷是子目的书名索引和著者名索引。

《中国地方志综录》 朱士嘉先生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编成的《中国地方志综录（增订本）》，普查了十二个省、市二十八个图书馆及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所收藏的地方志，著录现存方志七千四百一十三种。附录台湾所藏稀见方志目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稀见方志目。此《综录》在一九五八年出版。据《世界图书》一九八二年第一号称：“我国地方志的收藏总数，根据以前的专题目录记载，大都认为只有八千多部。这次在北京天文台同北京图书馆配合下进行了较全面的普查（由北京天文台天文资料组编印了《中国地方志综录（待定稿）》），统计总数是一万二千八百六十三种。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一九七五年，周恩来总理在病重期间，发出了“尽快地把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编出来”的重要指示。这项工作，从一九七八年四月国家文物局召开南京会议部署到现在，已经取得很大的成绩。在编委会的领导下，先经过全国各地分头普查、著录，凡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西藏及台湾暂缺）的七百八十个图书馆（或研究单位及文物单位）参加。又经过一年多的集中汇编，分部类初审和复审，然后修改定稿，正式出版。它将是一部前所未有的国家现藏善本书品种的总登记目录。

普查还要做的工作 （一）《中国丛书综录》收录了《道藏》，但没有收《大藏经》（佛藏）。原因是《大藏经》不似《道藏》的著录那么单纯。《大藏经》的现存版本，有宋刻的《思溪藏》、宋刻的《碛砂藏》、金刻的《赵城藏》。

明洪武刻的《大藏》、明永乐刻的《南藏》、明万历刻的《嘉兴藏》、清刻的《龙藏》；又有明末至清初的《续藏》编刻，增书达三百一十种；清康熙五十五年左右，复有《又续藏》的编刻，再增书达二百二十种。海外则朝鲜有三次刻印的《高丽藏》，日本有《弘教藏》（中国据此本翻印为《频伽精舍大藏经》和《大正大藏经》，等等。稽勘佛教典籍的异同是个专门之学，而各版《藏经》的总著录，篇幅也很巨大。所以当时作出决定，佛藏这一丛书的总目、子目，另行编录成册。所以，这项普查工作，尚待完成。今天，因有吕澂先生的《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问世，为比勘异同的工作提供了方便。

（二）《中国丛书综录》普查的四十一馆，尚有漏查以及《综录》工作完成后新入藏的丛书，还有四十一馆以外各馆中未经著录的丛书应查编的，需要进行一次复查补充。

（三）《中国丛书综录》以丛书著录为范围，单刻本（或称单行本）排除在外。过去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编的《图书总目》，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的《汉籍分类目录》，都是把丛书的子目与单刻本混合在一起，分类编录，虽具有“中国现存古籍总目”的性质，但因为它们仅局限于本馆一馆之所藏，而没有普查的经营功力，所以它们又不能成为“中国现存古籍总目”。现在有了《中国丛书综录》这一普查的先行工作，那么要补的一课就是“非丛书”的“综录普查工作”，最后与《中国丛书综录》配对成为“中国现存古籍总目”。因而，对我们的古籍普查工作来说，采用最有利的现实条件来推进，需要建立一个“丛书”与“非丛书”的“两半球”的概念，以便于工作的进行并作

为统计的基数。

现存古籍总数的估计 罗竹风同志说：“据初步粗略统计，大约在十万种左右。”^①作为依据的是：

(一) 《中国丛书综录》提供的一个基本数字三万八千八百九十一種；

(二) 上述佛藏^②与丛书补充复查估计可增一万种左右；

(三) 单刻本可估计为相当于丛书收录的容量，即五万种左右，用以下根据算出：

(1) 地方志一万二千八百六十三种，但应除去已收入《中国丛书综录》方志类的二百种左右；

(2) 收录清代著作单刻本以及宋、元、明著作的罕传本的《贩书偶记》正、续两编的著录一万七千种左右，当然也要剔除其中以单刻本被著录可是那个品种也曾收入、呈现在丛书中的总数字^③；

(3) 通俗小说、民间唱本、地方剧本、家谱、碑帖、舆图和兄弟民族语文图书估计约两万多种。

① 《对整理古籍的一点意见》，《古籍书讯》第三期。

② 据任继愈教授说，现存汉文佛教经籍总数约为四千一百多种（《二种大藏经通检》稿总数为4,175号）。

③ 举例来讲，《偶记》收清嘉庆十三年经前楼原刻本《说文解字注》三十卷，但此书后来《皇清经解》、《四部备要》都曾收入；《偶记》又收清道光十八年单刻本《木棉谱》一卷，但此书在《艺海珠尘》、《昭代丛书》等丛书中皆已收录。又《偶书》中“地理类”著录的方志，在统计大总数时，其中绝大部分与《中国地方志著录》的著录复叠，皆需排除。

至于把一九六一年中医研究院、北京图书馆编成的全国五十九所图书馆的《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七千六百六十一一种，一九六四年王毓瑚先生编的《中国农学书录(增订本)》六百多种著录算进去，再加上(2)、(3)两项数字的扩大，把现存古籍种数加码到十五万种^①，并不完全妥当。因为医书与方志不同，已收进丛书的数量比较大，单刻本所占比重小；《中国农学书录》的著录，存、佚兼收，再加上存者多已收入丛书，因此剩下的单刻本的分量就更打不起来了。从“两半球”的概念出发来萃取统计资料，它们并不适用。

也有偏低的估计，把现存古籍框在五万种左右，如冯蒸同志在《近三十年国外“中国学”工具书简介》的“绪论”中说：“中国是文明的古国，已经有了近四千年有文字记载的悠久历史，在这期间产生的浩如烟海的古籍，究竟有多少种留传到现在呢？这个数字可以从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中找到。有人统计，该目录上共载有四万九千五百五十部汉文书籍。这是该研究所内所藏中国古书的总数。但是一般的古书，国外学者认为有五万部左右^②，这可以说是比较齐备了。”问题就是在于人文所的目录，只能代表该所的收藏与作为检索用的目录，而不具备也没有进

① 李克西：《中国古典文献知多少》，载《世界图书·A辑》一九八二年第一期。

② 见吉川幸次郎，《关于中国的书籍》，《展望》一九七七年一月号。

行普查的意图与功力，所以不能代表中国现存古籍的总数。^①

情报业务是个长期的工作 一旦实现了丛书范围与非丛书范围“两半球”的古籍普查工作，完成了“中国现存古籍总目”之后，也还是要维持情报业务，因为地球之大，随时还会有新的发现。特别是具体校理某种古籍的，必须掌握此书的各种版本，于是披荆斩棘，逢河搭桥，寻踪追索，铁鞋踏破。李一氓同志跋明万历间徽州吴勉学师古斋刻本《花间集》云：“余校《花间集》时，不知有吴刻，付印撰《校后记》时，知有吴刻，而无公私著录可踪迹，无传本可验证，故曰据《歙县志》云云，窃谓此刻殆绝本矣。一九五八年冬奉召回国，某日午后，由寓闲步至中国书店，主者出示此册，赫然吴勉学师古斋刻本也。……明鏤《花间集》，最后得师古斋本，何殊宋槧？”^②可谓体会之深。

陈智超同志为正式整理《宋会要辑稿》作准备工作，追寻民国初年著名浙江藏书家嘉业堂主人刘翰怡（承干）在购得徐星伯（松）原辑本后请刘富曾等人整理清缮出的“嘉业堂清本”，几经周折，从北京图书馆找出两捆“有整册的，也有零篇断简”的稿件，查核清楚它只是徐星伯原辑本被删去的内容；于是，又在北京、上海两地“先后访问了与嘉业堂有过接触的同志”，获得线索，然后追踪到杭州浙江图书馆，经他“一再介绍嘉业堂清本的情况和特征”，图书馆同

① 这里提一个“第二半球”的参考数字：上海图书馆古籍组在编成《中国丛书综录》之后，逐步清理编制该馆所藏《综录》以外古籍的目录，至一九八一年底，写成卡片约有八十万张。这八十万项，有同一书的不同版本，有同一版本的复本。因为尚未作过细的稽勘异同，目前还不能提出一个馆藏《综录》以外古籍的品种数字。但是，他们做的一个约略的估计是四万种到五万种之间。那么，此数与前述的（二）、（三）两项估计的总数接近。

② 《一氓题跋》，第一七五页。

志“从书库中拿出几册没有编目的稿本”让他鉴定，“打开一册封面”，赫然是他“在京、沪两地遍觅未获的《宋会要辑稿》刘氏嘉业堂清本，不禁大喜过望。于是，浙图的同志从书库中将这部零乱无序的稿本全部搬出来，经过清理，全部四百六十册完整无缺，这部埋没了多年的稿本终于在人间复出。”回京以后，细查了北图所藏稿件中被删去的内容，证明它们实际上不全是重复的辑文，而是：“（一）内容虽然相同，但因为辑自《大典》的不同字韵，在使用和整理时仍可作校勘之用；（二）同一内容，但比今本徐辑本详细，可以补今本之不足；（三）为今本徐辑本所缺者。”所以，智超同志认为，“把这一部分内容称作‘遗文’，比‘复文’更为确切。”^①这个生动事例表明，有时候图书情报的工作，还必须搞整理工作的学者亲自出马，寻踪探索。

辑佚书 清查现存古籍的家底，当然排除已佚（失传）书的著录，但是，佚书之经辑录重光者，仍在登入总帐之列。辑录佚书的工作，从宋代已经开始，如王应麟采掇诸书所引郑玄注《易》成《周易郑康成注》一卷，集录齐、鲁、韩三家《诗》说，成《三家诗考》一卷。明人孙珏征集五经及《论语》、《孝经》的纬书为《古微书》三十六卷。清代学者有专以辑佚成家者，如历城马竹吾（国翰）辑经部书四百四十四种（内纬书四十种）、史部八种、子部一百七十八种为《玉函山房辑佚书》，甘泉黄右原（奭）辑经解八十六种、通纬五十六种、子史钩沉七十四种为《汉学堂丛书》，而乾隆时四库全书馆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经部书六十六种、史

^① 《〈宋会要辑稿〉遗文、广雅稿本及嘉业堂清本的再发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一九八二年第一期。

部四十一種、子部一百零三種、集部一百七十五種合計三百七十五種四千九百二十六卷（包括收入《四庫全書》以及存目于《四庫總目》的），这样就大大丰富了古籍現存書的品種。

四庫館開采《永樂大典》，並沒有罄其礦藏，故遺珠往往而有。清嘉慶時大興徐星伯（松）輯出的《宋會要》，道光時張石舟（穆）輯出的《元朝秘史》，就是顯著的例子。後來《大典》遭庚子年八國聯軍焚劫之災，幸存者不足三十分之一，可是里面還有東西可供掇拾，如朱桂辛（啟鈴）和刘士能（郭楨）从中輯出元代總結木構機械工藝著作的《梓人遺制》（一九三三年中國營造學社印），我曾輯出宋元農藝著作《種藝必用》（一九六三年農業出版社印）等。^①

魯迅先生曾從古類書及《太平廣記》等書輯出隋代以前的亡佚小說三十六種為《古小說鈎沉》。近年輯錄印出的“再生”古籍，有王叔武輯滇省已亡史志十四種為《雲南古佚書鈔》（一九七九年），容肇祖輯出王安石的佚著《老子注》（一九七九年）^②等等。可見輯佚工作，還是大有可為。李一氓同志在《論古籍和古籍整理》中也着重提了：

“古人從許多叢書、類書中沙里淘金似的，輯出了不少佚

① 其他尚有可供輯錄的，可參看拙著《讀影印本〈永樂大典〉記》，載《圖書館》一九六一年第四期。

② 王安石新政失敗，他的新學著作亦遭厄運，所存唯詩文編集而已。然安石之學，皆有創新之見，治中國學術史與思想史者，必百計求其緒余以為研索之資。現輯錄安石佚著者，尚有邱漢生同志之《詩義鈎沉》。我曾兩度輯錄《熙寧字說鈎沉》，一喪于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日軍寇滬之役，再喪于十年動亂，今方再事輯集中。

书，对学术贡献很大。如薛居正的《旧五代史》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今后还有许多工作好做。”

出土书 “地不爱宝”，古代文物，往往出土，远至殷墟甲骨。世间佚亡的书籍，也往往有自冢墓间出。晋太康间汲冢被发，得竹书数十车，就是一个著例。《唐书·艺文志》著录《汲冢周书》十卷。《汲冢周书》、《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就是这个来历。建国以来，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工程以及对文物考古发掘、保护、鉴识人才的培训，文物工作有了空前的发展，使世人对于我国古代文明和历史进程得到无数的物质见证，同时也多次发见了先秦、汉初的久已掩没的古籍，如一九七二年四月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同年五月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秦国竹简。银雀山一号墓出土竹简四千九百四十二枚，内有《孙子兵法》、《孙臆兵法》、《六韬》、《尉繚子》、《管子》、《晏子》、《墨子》、《相狗经》、《阴阳书》与风角灾异杂占残简。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除了《老子》（甲、乙两本）、《易经》和《战国纵横家书》的部分篇章有传世今本可资对比外，其余久已佚失的古籍有《经法》、《十大经》、《称》、《道原》（以上四种可能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黄帝四经》）、《天文书》、《五十二病方》、《导引图》）等；还有三幅地图：长沙国南部地形图、长沙国南部驻军图和一个县城的平面图。睡虎地十一号墓出土了秦简一千一百五十余枚，共有《编年纪》、《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日书》（甲、乙两本）等十种书籍。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武威柏树公社兴修水利工程时，挖出一座汉墓，内有简、牍共九十二枚，都是有关医药的文字。它的内容都是医治各科疾病的医方。^①一九七三年，河北省定县四十号汉墓出土大批竹简，经整理组释读出有以下各书：《论语》、《儒家者言》、《哀公问五义》、《保傅传》、《太公》、《文子》、《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纪》、《日书·占卜》等。^②

敦煌遗书总目的最后完成问题 甘肃敦煌莫高窟石室藏书，自十一世纪初期（宋初）封闭以后，至一八九九年才被发现。在一九〇七至一九〇八年间，先后被英法人士斯坦因（Aurel Stein, 1862—1943）、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所盗劫，一九一〇年清政府学部才搜寻残余部分，运往北京（运送途中有被盗及零星散失在民间的），其间，日本人大谷光瑞、桔瑞超又到敦煌进行购劫。最后，沙俄的奥登堡（С.Ф.Опбурп, 1863—1934）进行了最后的搜索，劫去近一万卷，但是这次搜劫秘而不宣，所以过去一直不为外间所详细了解。

由清学部递转到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八千卷，陈援庵（垣）先生曾编印《敦煌劫余录》，著录极详（北京图书馆在解放后，又有所得，现共有一万卷以上）。伯希和劫走的二千五百卷（西藏文卷不包括在内），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八年，王有三（重民）先生在该馆统阅一过，编成《伯希和劫经录》。斯坦因劫走的七千卷，藏于

① 《文物》一九七三年第十二期。

② 《文物》一九八一年第八期。



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内。解放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过交换的方式，换回了这七千卷的一套缩微胶卷^①，由刘铭恕同志统阅一过，依据原卷内容，编成《斯坦因劫经录》。

一九五九年，是这一中古时代的文化典籍大发现的六十年。商务印书馆委托王有三先生主持，将上述三个敦煌遗书目录，加上国内其它公私收藏和日本公私收藏的目录，汇编了一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共著录二万二千五百卷，一九六二年五月出版，是目前最好的但仍非完备的一部敦煌书目，由于当时苏联尚秘其沙俄时代奥登堡劫经之事，所以《总目索引》中既未包括奥登堡的目录，也未提到其事。

先是，我文化部前副部长郑西谛（振铎）同志生前访苏时，已有所闻，然征询其藏目而未得要领。这种情况，就有所反映在向觉明（达）先生于一九六四年八月写的《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引言》中（该文印出已在一九八一年二月）。内云：

“敦煌石室藏书总数将近三万卷。分藏于我国的北京、苏联的列宁格勒、英国的伦敦以及法国的巴黎四处。日本私人手里也藏有若干卷。北京、日本所藏并无《大唐西域记》。苏联所藏敦煌卷子为鄂尔敦堡（奥登堡）从敦煌拿去的，既未发表过目录，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卷。据参观过的人估计，数将及万。近年来苏联科学院亚洲人民研究所刊行了《东方古代文献小丛书》，其中有《敦煌变文钩沉》一种，刊布了《维摩诘经变

^①一九五七年英人帮理斯（Lionel Giles）编的《不列颠博物馆藏敦煌卷子目录》著录为8,102件汉文写卷。